

“普遍智能”、劳动者“主体性” 与“非物质性”*

——意大利自治主义“非物质劳动”概念批判性考察

李雪阳

[摘要] 在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之上，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将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涌现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且具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特征的实践活动冠以“非物质劳动”称谓，并视劳动者“主体性”彰显为其主要特征。然而，“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一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其不仅赋予劳动者“主体性”彰显过多乐观想象，淡化或遮蔽了“非物质劳动”得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与条件，而且，自治主义者尝试从劳动结果界定这一概念的做法并不成功。这一切从逻辑上均始源于对“机器论片段”中有关“普遍智能”及资本主义演变趋势论述所产生的某种曲解与误读。

[关键词] “非物质劳动” 意大利自治主义 “机器论片段” “普遍智能”

[中图分类号] F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461(2024) 11-096-13

出于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加之受到某些事件的强烈刺激，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分别于 20 世纪 60、70、90 年代一再翻阅和阐释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这一被他们誉为“圣经式”的文献。他们力求在马克思的理论预测与新的社会—历史挑战之间探寻一条“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解放之路。正是在对“机器论片段”展开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自治主义者对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涌现的崭新劳动形态及组织模式进行积极思考，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非物质劳动”者的主体性彰显为其主要特征之一。

* 作者简介：李雪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意大利自治主义“非物质劳动”思想概览

（一）对“机器论片段”的反思和批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被意大利自治主义者誉为“圣经式”或“神启式”文献。对他们而言，这一文献之所以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首先在于其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基本趋向的思考，而这一思考恰恰是马克思其他作品中较为缺乏的。^①更重要的是，这一文献中的许多预言式描述似乎已成为当下事实且对深刻理解或改观现状具有启发性。对此，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解释道：“在西方，每当英雄面对某些重大的困境时，它们便会从《旧约》中引出一段经文，或者是来自诗篇又或是来自以西结书的字句，英雄会把这些字句从其各自的文脉中剥离出来，并让这些字句自然地滑进当下的偶然处境中，使这些字句成为解释当下困境的有力的预言。……于是，那个圣经文本会以短路的方式与当下实际的危急境况联结起来。《“机器论片段”》就是这样一个圣经式的文本。”（许纪霖等，2006，第163页）然而，有趣的是，自治主义者对于这一“圣经式”“神启式”文献的赞赏与推崇却并未演变为某种盲从和迷信。换言之，正是得益于对当代社会和经济所展开的实证性研究，他们对“机器论片段”能够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审慎的态度。

1. 对关于资本主义演变趋势预判的质疑

“机器论片段”受到自治主义者质疑与批评最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基本发展趋势的思考或展望部分。在自治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的思考或展望虽然具有较为独特的理论价值，不过，其却似乎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客观发展情形有所差异。质言之，“机器论片段”对知识被对象化（objectified）为生产机器且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角色的描述，虽然在“后福特制”时代早已成为“横在我们所有人眼前”的现实状况，但马克思有关革命运动高涨的预判以及当科技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融入生产过程，势必导致“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发生崩溃，从而令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的展望却远未实现。人们看到的现实状况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某种应激调整及快速变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资本统治、强化了其对劳动的剥削压迫。“知识所起的作用和渐成次要的劳动时间之间的不均衡并不是孕育危机的温床，却催生了新的、稳固的权力形式。生产观念的激进蜕变，一如既往，属于老板手下工作的范畴。要说‘片段’是暗指胜利已经在望，却更像为社会学家准备的工具箱”（保罗·维尔诺，2017，第131页）。20世纪80年代迄今，“伴随着马克思所预测的‘普遍智能’社会一起到来的，

^① 维尔诺对此谈道：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超越主导生产率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更有名的假设绝然不同。在‘片段’中，资本主义危机不再归因于真正基于个人提供劳动时间的生产资料内在的比率失调（因此，也不再归因于与‘价值规律’的威严相关联的失衡，例如，利润率的下降）。现在面临的是：直接地、专一地调用科学的生产过程与仍然同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相符的财富计量单位之间相割裂的这个矛盾走到了前台。根据马克思所说，这种差异的逐步扩大意味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并因此导致共产主义。”参见[意]保罗·维尔诺，董必成译，2017：《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1页。

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革命，而是集团资本家的管理和组织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许纪霖等，2006，第174页）。

2. 对“普遍智能”仅存于自动的机器体系观点的批评

自治主义者指出，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展现为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一般智力或“普遍智能”（general-intellect），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越来越显著地融入自动的机器体系中，或者说，其仅仅只是存于自动的机器体系中、只是浇铸进钢铁里（cast in iron），同劳动相对立并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然而事实却是，“普遍智能”是作为“活劳动”的属性而存在的，其“首先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一部分“普遍智能”不凝结为固定资产，而是以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的名义在交流互动中展开，这是必然的”（保罗·维尔诺，2017，第82页）。

在将马克思劳动概念简单视为一种体力和机械力属性聚合范畴的基础之上，自治主义者从一般意义上对劳动概念做出了讨论，不仅肯定“劳动力（labor-power）”内含着精神性、知识性因素，而且突出强调了劳动过程的“历史—社会”特别是人际交往的维度。依据《资本论》对劳动力的定义，维尔诺提出，劳动力意味着一种生产潜力，即“泛型的、待定的潜在可能性”，也就是天资、活力、能力等，据此，劳动力理应包含“精神生活”（保罗·维尔诺，2017，第104页）以及“大众知性”或“普遍智能”，而“普遍智能”是指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记忆力、进行抽象化和相互关联的能力、自我反思的能力等（保罗·维尔诺，2017）。进而，维尔诺指出，马克思常常将劳动过程描述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有机更新的自然过程，似乎缺乏对社会—历史特别是人际交往维度的考量，不过只要劳动过程中存在着交流，就不应从劳动的概念中剔除人际互动方面，即劳动者相互之间的关系。

此外，从一种社会“非连续性”变迁视角出发，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经验性观察，自治主义者竭力强调自20世纪70年代初“大变革”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劳动形态和劳动组织模式所呈现出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劳动过程所呈现出的知识技能性、信息智能性和自主际性等诸多崭新特征。在他们看来，“普遍智能”一向是作为“活劳动”属性而存在的，“普遍智能”社会中后福特制生产模式及其形塑后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则将这一属性空前凸显出来。对此，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一书中做了一个有趣的哲学分析。通过援引亚里士多德《劝勉篇》（Protrpticus）中将思想家喻为“异乡人”的观点，他指出，当今“诸众”（不是“人民”）的显著特质之一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not feeling at home），“诸众”就是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这种状况是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诸众”除了必须表现得像个思想家外，别无选择。“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并非要钻研一些生物学或高等数学，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飞来横祸的打击而转向最基本的抽象智力范畴，是为了躲避意外和不测”（保罗·维尔诺，2017，第45页）。一言以蔽之，为了生存，“诸众”必须拥有“普遍智能”。

（二）“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

1. 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的来临

自治主义者一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大变革”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迈入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换言之，“机器论片段”中有关“普遍智能”广泛且深度融入劳动资料和

生产过程的描绘早已成为一种“横在我们所有人眼前”的实际状况。根据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界定，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意味着：对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一种“理想型”描绘，其内涵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即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产业主流形态、科技成为新工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新技术权贵崛起并开始制定经济—社会规则，以及新轴心结构和轴心原则兴起（丹尼尔·贝尔，2010）。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即“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首要性是组织新技术、经济成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轴心。我们可以在经验上设法显示这种轴心原则正在先进工业社会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丹尼尔·贝尔，2010，第141—142页）。与贝尔的界定相类似，自治主义者亦着重从科学技术和信息知识日渐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推动力量视角去理解与阐释后工业社会。在他们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与调控方式方面，福特主义日趋衰微，相应的各类后福特制形态井喷式涌现；在产业形态方面，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超越第一、第二产业一跃成为主导经济产业形态；在劳动方面，神经机械学、计算机管控、信息交流等成为日常工作所需的主要知识和技能；在公众领域，曾经一度专属资产阶级文化商品生产的行为逐渐进入大众智能领域。

2. “非物质劳动”——一种应运而生的复杂劳动

新的社会形态势必有所新的劳动形态与之相适应。在自治主义者看来，当后工业社会悄然来临，一种隶属于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范畴的崭新劳动形态——“非物质劳动”遂应运而生。与后工业社会具有一致性，“非物质劳动”同样是以科学技术和知识信息作为自身的轴心结构和轴心原则。维尔诺认为，由于充分调动了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特征为高智商和高效率，因此，其不能化简（not reducible）为“简单劳动”（保罗·维尔诺，2017）。莫利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将“非物质劳动”明确定义为一种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这一劳动形态主要体现为下述劳动实践：音像制品生产、广告制作、时装生产，软件生产，摄影，文化活动等（许纪霖等，2006），并大体可被视为一种“在生产性合作的启动和商品文化内容的生产中把“主体性”投入到工作的过程”（许纪霖等，2006）。奈格里和哈特则尝试从劳动结果（产品）角度界定“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提出，“非物质劳动”是一种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并将“非物质劳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大工业生产中涉及信息通信或文化生产的劳动；二是具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的智力劳动；三是涉及感情生产与控制或涉及（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的劳动（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2008）。

3. “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特征

自治主义者将“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劳动自主性增强、劳动主体地位有所上升；第二，模糊或取消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本来在工业生产时代泾渭分明的界限；第三，劳动关系日趋灵活、流动与不稳定；第四，“过度剥削性”非常突出；第五，显著的“层级结构性”；第六，劳动社会化程度愈益提升，为建立劳动的自主政治组织提供了新的基础；第七，劳动过程变得日趋简化与同质化；第八，生产组织由流水线线性关系转变为无数的、不确定的网络分布结构关系，即“非物质劳动”流域（the basin of immaterial labour）由分散的工厂（diffuse factory）、去中心的劳动组织，以及第三产业多种多样的形式共同构筑。“之所以称这

个新地理坐标为‘流域’，主要是因为新的去中心的劳动组织的空间形构已不再被旧式工厂的四道围墙所限”，“这种新的劳动组织以网络和流动的形式存在，其所横越的空间层面已不能被过去的模式所包纳”，“跟工厂规律化的劳动空间组织不同，在这个流域里，各种规模极小的生产单位（往往是单个的个人）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它们只会在某个特定的工作时段或特殊的工作计划中被组织起来”，“一旦工作完成后，整个循环圈会重新融入整体的网络或‘流域’之中，以维持整体生产力的再生产和充裕储备”（许纪霖等，2006，第175—176页）。质言之，“非物质劳动”与“泰罗主义”和“福特制”模式下的传统劳动形态有所差异，其不仅生产“非物质性”商品，而且最首要的是生产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创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二、“普遍智能”议题辨析

尽管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只有寥寥几次提到所谓的“普遍智能”，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一概念不仅受到自治主义者的青睐与重视，而且更成为他们“非物质劳动”概念得以形塑的一个预设性理论范畴。也许同“机器论片段”一样，“普遍智能”概念令自治主义者深为着迷的原因，一方面是其某种意义上深刻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并没有严格遵循马克思的预判。正是这种悖论式的存在，为自治主义者在理论和现实解释之间探寻一种平衡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在以“机器论片段”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广泛而集中的应用是建立在“普遍智能”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①同工人与生产物质条件相分离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具有相似性，自动的机器体系中的“普遍智能”与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亦造成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某种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力学、化学、电学等领域的科技知识越来越广泛且深入地融入自动的机器体系中以推动生产力持续提升，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越来越“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时；^②另一极是，单个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及技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逐渐丧失普遍性和应用价值，同时资本竭力剥夺工人学习的基本权利（充其量只让其获得一些操作方法的的知识而已），“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③自动的机器体系中的“普遍智能”对工人而言成为了一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工人自身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且不断被“边缘化”），工人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工厂中“没有头脑”的“有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识的肢体”，资本却在同一进程中转变为拥有科技知识所有权、话语权和掌控权的“头脑”。自动的机器体系“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①

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实证研究，自治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所提出的“普遍智能”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其不仅深刻揭示出在资本宰制下“普遍智能”“资本化”的异化状况，即“普遍智能”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越来越“被吸收在资本当中”，“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从而“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开始与劳动相对立，而且更深刻昭示出“普遍智能”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日益融合的基本发展趋势，“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②“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③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所展望的这一发展趋势，在后工业社会已经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普遍智能’对观察和研判后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演进趋向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在有的人看来，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关于“普遍智能”的论述却传达出这样一种看法：“普遍智能”主要存于自动的机器体系之中。毋庸置疑，无论是从“普遍智能”概念的主要内涵抑或是从后工业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观点均略显偏颇。

实际上，自治主义者对马克思有关“普遍智能”主要存于自动的机器体系观点的指责，既不符合“机器论片段”的相关论述，亦不符合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客观实际。在马克思那里，“普遍智能”概念的内涵主要为：人类社会已有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及生产经验。这意味着，所谓的“普遍智能”事实上存在于三个领域，即专业领域（包括科学学科和技能经验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和生产劳动（一般生产力）领域。“机器论片段”突出强调了“普遍智能”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领域中的实际状况：“普遍智能”越来越广泛且深入地融入自动的机器体系之中，自动的机器体系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形成了“连续不断的”、“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的庞大体系。^④更重要的是这一状况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持续演进至未来。于是，自动的机器体系这一“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或“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最终势必令工人的劳动沦为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即“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障”，^①“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②不过，除了生产劳动（一般生产力）领域外，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从未否定过“普遍智能”在专业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存在的可能性或现实性。恰恰相反，他始终为“普遍智能”转化为劳动者个人智识、经验和技能以及劳动者个人智识、经验和技能的持续涵养与不断提升预留了工厂—企业之外的广阔得多、丰富得多的社会—生活场域。马克思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两个相分离”，特别是融合进自动的机器体系之中的“普遍智能”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日趋分离的状况，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劳动者个人丧失了所有的“普遍智能”或不再有机会拥有有别于生产领域的某类具体的“普遍智能”。换言之，“普遍智能”既可以从专业领域进入生产劳动领域，也可以从专业领域进入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始终坚信，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必然性发展趋势，自动的机器体系由于吸纳更先进的“普遍智能”无疑将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和高效，“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③于是，无论资本愿意与否，劳动者获得相对“劳动时间”而言更多（或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④“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⑤

自治主义者针对“机器论片段”中有关“普遍智能”论述所展开的批评，源于他们坚信，后工业社会的劳动已经演变为一种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具有创造性、象征性的实践活动（即所谓“非物质劳动”），这一崭新劳动形态不同于马克思聚焦与讨论的那种劳动者逐渐丧失“普遍智能”（工厂式）的简单劳动和物质性劳动。换言之，“非物质劳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劳动者拥有和掌控“普遍智能”，其主要从事具有创造性、想象性和技能性的“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非传统工作”。基于某种社会“非连续性”观点，自治主义者对“非物质劳动”做出了脱离现实的判断及描述。应当承认，相较于以往，后工业社会的确出现了大量所谓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具有创造性“象征性”的新兴产业及工作岗位，由于强调从业者个体“智识”创新运用的高度重要性，此类后工业社会中的崭新劳动形态显得不同于传统“流水线”旁的机械性简单劳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工业社会中众多新兴产业和工作岗位的出现并未能全面取代传统产业和工作岗位，此类所谓“非物质劳动”既不具压倒性优势，也远未成为主流。或许是由于深刻洞悉到了这一点，奈格里和哈特才对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做出了某种修正：“当我们说“非物质劳动”正在占据霸权地位时，并不是说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工人主要生产的是非物质产品。相反，农业劳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数量上居主导地位，而全球的工业劳动在数量上也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有降低。“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而且集中在地球上的支配性地区。我们的观点是“非物质性”劳动就质的方面而言已成为霸权，并且决定了其他的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许纪霖等，2006，第32页）“机器论片段”对“普遍智能”日益融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且与工人个体“智识”和“技能”相分离的有关阐释对认识和理解后工业社会的劳动状况仍然具有有效性：一方面，自动的机器体系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采用“普遍智能”，以致许多人工岗位已经或即将被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取代；另一方面，自动的机器体系不只是存在于工厂内，其实际上已逐渐蔓延到农业和第三产业领域。

三、虚妄的劳动者“主体性”

在《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等一系列文献中，马克思对工具和自动的机器体系进行了区分：工具是前机器时代的劳动资料；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机器生产时代的劳动资料。“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①在前机器时代，当工人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时，工人将工具当作自己延伸的器官并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其灵魂，工具在工人的生产劳动中仅仅起到一种中介作用，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劳动者“主体性”因之而得以充分彰显。在机器生产时代，当工人通过自动的机器体系进行生产劳动时，一切都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活劳动”从属于自动的机器体系并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者“主体性”渐趋被复杂而庞大的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吞噬。“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②

在自治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有关劳动者“主体性”的论述或许在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是正确的，但其已难以解释后工业社会所涌现的崭新劳动形态——“非物质劳动”。自治主义者普遍认为，由于信息化、智能化和通信技术广泛融入大工业生产中，“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即为劳动者“主体性”的充分彰显（而非劳动者“主体性”遮蔽或丧失）。“一种多形态的自雇式自主工作已经显现为主导的形式，一种他或她本人就是企业家的‘知识型工人’被嵌入到了一个变动不居的市场之中，被嵌入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可变的网络里”（许纪霖等，2006，第145页）。在拉扎拉托眼中，“非物质劳动”这一主要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后工业社会中每一位生产主体的实践特点。“在当今大规模被重组的公司企业中，工人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日益牵涉到一种在不同选项中抉择的能力，因而也牵涉到某种程度的关于决策制定的责任……围绕着“非物质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被组织起来……这种把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为控管和操纵信息的劳动、转变为牵涉到“主体性”投入的决策能力的过程，以各种方式在工厂等级内部按照工人的地位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他们产生影响……在这个时期里，工人会被当成各种生产功能的协同操作中的‘能动主体’，而不是服从简单指令的奴隶”（许纪霖等，2006，第140页）。

应当指出，自治主义者所鼓吹的作为后工业社会中“非物质劳动”主要特征的所谓劳动者“主体性”彰显实际上是一种被赋予了过多浪漫想象的错觉。自治主义者对“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主体性”彰显的诸多描述与刻画，如“劳动自主性增强、劳动主体地位有所上升，生产合作的关键（中心）形式不再是由资本家创造的作为劳动组织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劳动自身的生产能量中产生出来”等，实际上由于淡化了对“资本—劳动”辩证关系中资本主导方面的关注和分析，将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自由度和创造性过于放大并同“主体性”概念相联系，不仅弱化了人们对资本规约压迫性、剥削残酷性的认知，更扭曲了人们对“主体性”真实内涵的理解。当新自由主义在后工业社会成为一种主流经济政策或政治意识形态时，当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丛林法则、高度弹性合同制、大量劳动者常备军等观念和现象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常态时，“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主体性”彰显便荒诞而讽刺地展现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和绝对劳动时间持续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浓缩或劳动强度不断提升；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流动性急剧加快；劳动者普遍深陷（低薪或免费）自主加班、过度劳累、薪资微薄、保障缺失、身心困顿、生活（乃至生命）危机等境况之中。即便是奈格里和哈特刻意强调的“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情感型劳动”，其所内含的劳动者“主体性”亦可被视为某种深度误解或不幸幻觉：“许多服务业虽属于情感性劳动，但劳动者仍处在泰勒制的管理模式之下，这些劳动活动并不具备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特点，我们也很难从这些劳动活动中预见到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哈特和奈格里低估了生产行为的复杂性与资本对劳动活动的控制能力，对劳动的分类陷入了二元论与本质主义的错误。正如柳迫（Sylvia Yanagisako）通过研究意大利制造业历史所发现的，工业劳动中从不缺乏交流与合作的维度，而服务劳动中也不乏‘工业制造’的维度”（王峰明和王叔君，2022，第20页）。

关于后工业社会，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曾这样评价道：这样一种社会决“不是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全新事物，而且剥削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核心方面”（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20，第221页）。与此相应，“非物质劳动”亦不是一种全新事物。换言之，在资本全面深度宰制之下，剥削同样是理解后工业社会中“非物质劳动”的关键词、核心词。正因如此，作为后工业社会中“非物质劳动”主要特征之一的劳动者“主体性”彰显无遗只是一种具有迷惑性的假象而已，相较于工厂流水线式的劳动，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确实展现出了较高的自由度和创造性，然而，这却无法成为否定其始终受到资本力量操控且完全服从资本逻辑的理据。在劳动过程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和创造性绝不意味着劳动者拥有真正的“主体性”，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在享受工作时空高度弹性化、自由支配工作时间和强度，以及自傲于劳动过程的知识化、信息化、创造性时，却总会隐约听见资本在身后不时传来的嘶哑低吼：“将工人的灵魂转化成工厂的一部分！”（许纪霖等，2006，第140页）对于“非物质劳动”者“主体性”的虚幻性，拉扎拉托还算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尽管在后工业社会中劳动者“主体性”彰显的确可以被视为“非物质劳动”的一个主要特征，不过，这种“主体性”却无时无刻不处在资本专制主义掌控之中。他认为，“非物

质劳动”虽激活了劳动者个体真正的个性，却又与之相抵触。其根本无法根除等级与协作、自主与命令之间的矛盾对抗状态，而是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提出这种对抗性。“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一种独裁主义话语：一个人必须表现他自己，必须交谈、沟通、合作等等。这种‘论调’跟在泰罗制之下的行政命令中人们所听到的论调一样；改变了的只是内容而已。……（无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沟通关系均完全在形式和内容上被事先决定好了；除了服从‘信息流通’，别无选择。主体变成了编码和译码的单纯的传送者，他所传达的信息必须是‘清晰不含混的’，在沟通语境中完全被管理所规范化。施加命令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规范化的沟通形式”（许纪霖等，2006，第141页）。所以“‘你们是主体’成了回响在西方社会中的新指令”，“当我们在面对‘你们是主体’这句口号时，我们所面对的便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专制论述”（许纪霖等，2006，第176页）。

四、“非物质性”的含混模糊性

由于顽固秉持某种社会非连续性理论，“非物质劳动”概念不仅在经济—社会分析上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断裂性，同时更由于其内涵及外延上的模糊性和含混性，使得这一概念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自治主义者一直力求突出强调“非物质劳动”这一后工业社会崭新而主流的劳动形态的“非物质性”，不过，这一劳动形态的所谓“非物质性”却是令人感到困惑和不解的。倘若从劳动环境与劳动条件来看，我们很难设想一种能够完全脱离物质性环境和条件的劳动形态，让欲念和思想可以毫不费力地翱翔于“非物质性”时空，但现实的诸般劳动却须臾难离“物质性”环境及条件。例如，劳动得以进行的由物质性材料所构筑的场地和空间、劳动者进行劳动的物质性器官、劳动者进行劳动所使用的工具设备，等等。这一点恰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讨论社会生产力（形式）发展及迭代时正确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实为一种通过多种剥削形式推动剩余价值生产的综合发展形式，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没有虚拟化生产或使其无量化或非物质化，恰恰相反，其必须以物质性生产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中的所谓“非物质劳动”并没有消灭而仅仅只是扬弃了其他多种传统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劳动”一向需要大量的物质生产（如农业生产、矿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作为其存续的根本支撑（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20）。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界定，奈格里和哈特曾有过一次（细微却重要的）转变，即从“非物质劳动”三类型说（其一，大工业生产中涉及信息通讯或文化生产的劳动；其二，具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特征的智力劳动；其三，涉及感情生产与控制的劳动）演变为“非物质劳动”两类型说（其一，脑力或语言类的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类似产品；其二，情感型劳动，即产生或控制情感，例如轻松、幸福、满足、兴奋或热情的感觉的劳动）。针对奈格里和哈特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界定的这一转变，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表示，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原因在于，“尽管制造工业中电脑程控的应用包含了信息科技，但如果因此就将其描述为‘非物质’生产将会是个误导。比如，现在汽车生产的许多方面都是自动化和电脑控制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汽车制造不再是一

个物质过程，或者说，汽车工人不再从事‘物质生产’。尽管现在是机器在工作，普通工人不再‘弄脏他们的双手’，然而，通过控制这些机器，他们仍然拥有物质财富并生产物质产品。他们的工作依然是物质的”（肖恩·塞耶斯，2007，第38页）。应当说，某种程度上，这一转变看似细微、看似无关大局，然而，其事实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逻辑维度而言，自治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抛弃了维尔诺基于批判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之上建构起来的宽泛界定，进行了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收缩；从时间维度而言，自治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开始回归20世纪90年代拉扎拉托从生产结果角度进行界定的最初路径。

即令是以拉扎拉托、奈格里和哈特等人为代表的自治主义者坚持仅从生产结果或劳动产品角度去界定“非物质劳动”概念，这一概念一贯力求凸显的“非物质性”仍旧是含混而模糊的。首先，后工业社会中的“非物质劳动”所创造出的成果或产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固形为某一类特定物质形态，如承载了思想和理论的文字表述需要以纸质的笔记、报刊、书籍等作为物质性载体，照片录音录像需要以胶片或磁带等作为物质性载体，电脑程序软件系统需要以光盘硬盘等作为物质性载体，等等。换言之，唯有获得某种合适的物质性载体，流动易变、抽象缥缈的“非物质劳动”成果或产品才能实现稳定保存、有效应用及长久传承。对此，塞耶斯认为，不应将“‘符号性’工作想象为是没有物质结果的，并且认为仅仅是那些直接创造有形产品的劳动——如工业或手工业——才是物质活动。符号性劳动并不只是创造符号或观念——纯粹主观性的、无形的产品。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符号性劳动也不例外——它在纸上作出记号，制造声音，在电脑系统中制造电子脉冲等等。……在这种程度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肖恩·塞耶斯，2007，第38页）。此外，一部分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如社会合作、公关、洽谈等社会性交往活动，虽不能直接创造物质成果或产品，但不意味着此类社会性交往活动缺乏物质性因素。暂且抛开此类社会性交往活动得以展开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不谈，仅从结果而言，此类社会性交往活动不仅生产、再生产着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也生产、再生产着人的思想内容和意识形态，从而间接地推动社会范围的物质生产及再生产并由此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持续变迁。诚如塞耶斯正确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某种例外的特殊的‘非物质’劳动或者单纯的‘生态政治’活动”，“这类工作和其他劳动一样，通过某种程度上有目的地生产物品并且改变物质环境，包括通过对话和其他交往活动形式，来实现自身的运作，它不会简简单单消失，它在世界中具体化，并且创造使用价值”（肖恩·塞耶斯，2007，第38—39页）。

五、结语

在不同历史时期，出于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一再访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这一重要文献。正是在对“机器论片段”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之上，依靠对后工业社会或“普遍智能”社会的经验性观察，自治主义者将那种以知识为基础且具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特征的实践活动冠以“非物质劳动”称谓并视劳动者“主体性”彰显为其主要特征。不过，由于对“机器论片段”产生的某种误读、经验性观察的局限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含混模糊性等原因，

“非物质劳动”远非拉扎拉托（通过比较齐美尔和巴赫金的劳动理论后）乐观表示的那样，实为一种超越体力劳动—智力劳动和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陈旧二元逻辑对立，且使概念与现实、劳动与创造、创造者与受众之间割裂状态获得弥合的全新概念。我们认为，在对“非物质劳动”概念展开批判之余，既需要对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具体历史语境及政治初心进行深入考察，更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探索既非完全囿于抽象思辨藩篱，也非全然对思想理论或现实实践毫无益处。这一点恰如张历君所指出的那样：“奈格里、拉扎拉托和维尔诺等自主论者对后福特社会或控管社会锲而不舍地钻研和探讨，其目的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简单超越或否定。相反，透过对马克思的超越和否定，他们希望最终在转变了的社会现实条件之上，重新召回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崩溃的预测或愿景。”（许纪霖等，2006，第187页）

参考文献

- [美]丹尼尔·贝尔，高铨等译，201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杨建国等译，2008：《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
-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张梧等译，2006：《〈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 [意]保罗·维尔诺，董必成译，2017：《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商务印书馆。
-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周延云译，2020：《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 [英]肖恩·塞耶斯，周嘉昕译，2007：《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1期。
- 李雪阳，2023：《对奈格里主体性解读的反思与批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
- 王峰明、王叔君，2022：《“非物质劳动论”及其理论缺陷——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评析》，《学习与探索》第3期。
- 许纪霖等主编，2006：《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General-intellect, Worker-subjectivity and Non-materiality: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Immaterial Labor” of Italian Autonomy School

LI Xueyang

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Fragment on Machines, which is known as the Biblical Text, the Italian Autonomists branded the knowledge based, creative and symbolic practice activities emerging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or universal intelligent society as Immaterial Labor and regarded the subjectivity of workers a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fact, the concept of Immaterial Labor is a very vague term, which not only gives immaterial workers too much optimistic imagination of subjectivity,

but also weakens or masks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on which Immaterial Labor lives. More importantly, the attempt of the autonomy theorists to define this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results further increases the abstraction of Immaterial. All this logically originates from some kind of misreading of the Fragment on Machines.

Keywords : Immaterial Labor ; Italian Autonomy ; Fragment on Machines ; General-intellect

【责任编辑：王韵清】